

前沿问题:

1. 苏联解体 20 年来,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的变化;
2. 俄罗斯思想界对解体的反思;
3. 苏联解体后产生的新问题与对策。

俄罗斯文学 20 年回顾

侯玮红

摘要 苏联解体 20 年来,俄罗斯文学既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剧变混乱的解体初期与走向稳定的新世纪十年两个阶段的不同,又遵循文学自身内在的继承与发展规律,存在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与必然性。本文试图从文学的外部环境、文学的地位与作用、创作队伍、创作倾向与内容、创作风格几个方面来说明文学发生的巨大变化,阐述今日俄罗斯文学自由的环境、“去中心化”的地位以及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特点,展望未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苏联解体 20 年 俄罗斯文学 回顾

A Review of 20 Years' Russian Literature

Hou Weihong

Abstract 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which Russian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has presented a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eriods: the first decade of upheaval and chaos right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econd decade of stability in the new century, and, on the other, following the intrinsic law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has displayed its continuity and inevitability in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e immense changes of Russian literature, to expound the free environment, the “decentralization” status, and the pluralistic features of creation content and form of today's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o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futur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literature,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he creation group, the creation tendency and content, and the creation style.

Keywords 20 years since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n literature; review

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弹指一挥间,俄罗斯文学走过了20年的历史。20年间,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迁,俄罗斯文学经受了暴风骤雨的考验,在彷徨与低迷中寻求出路,在危机与坎坷中坚持探索,终于走出低谷,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回首往昔,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图景犹如一块被重新翻过的土地,“发生了文学密码的完全转换”,^[1]不仅在文学本身、作家角色、读者类型上,而且在创作内容与美学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既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剧变混乱的解体初期与走向稳定的新世纪十年两个阶段的不同,又遵循文学自身内在的继承与发展规律,存在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与必然性。

一、自由与市场——全新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发展要素

随着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问世,苏联书刊检查制度彻底成为历史。从此文化与政权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不再接受国家的订单,国家也不再为文化提供固定保障。正如涅姆泽尔所说“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完全在一个新的概念中存在——那就是自由。”^[2]这种突然而至的自由,既使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惊慌失措到逐步调整适应的过程,也给他们的思想意识、文学观念乃至物质生活状态带来极大的分化。一部分在苏联时代受到压抑的作家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形势,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从以前的作品被禁、生活难以为继到如今的作品被国内外频频发表和出版,稿费、版税大大提高;另一部分人却对现状非常不满,与现实格格不入,甚至出现了解体之初两位大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和德鲁宁娜自杀的惨况。时至今日,俄罗斯作家与评论家对自由的理解与运用依然各不相同。著名评论家叶尔莫林谈到,对于一些人来说,自由令人联想

起伦敦的海德公园,对于另一些则相反,想到的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还有一些人只想挖苦嘲笑,不仅嘲笑苏联的,而且嘲笑一切崇高的东西。曾经因支持不同政见者而受到处分的沃伊诺维奇现在却觉得自由太多了,认为文学需要压力,俄罗斯文学中伟大经典的作品都是诞生在有压力的时代,而当代作家令人想起深海里的鱼,一旦把它们弄到水面上,倒是有了自由,却无法呼吸了。言外之意这样的时代无法产生优秀的作品。巴辛斯基的看法比较实际,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要学会生存,而不是被自由饿死,就要在写作之前考虑自己定位于什么样的读者。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社会和经济的休克中恢复过来的读者开始去书店了,就像去“宜家”一样。如果作家意识不到这就是“人民”,正是他们准备把自己的钱拿出一部分买你的书,那么作家就会因为“不被理解”而痛苦,实际上是他不理解别人。巴辛斯基把1990年代看作自己文学的故乡,是童年和少年生长的地方,而认为2000年代是生活和工作的地方。1990年代他长年在《文学报》无偿工作,虽然经济上不宽裕,但是有许多的希望和梦想,许多的浪漫与激情,许多的朋友和敌人,而2000年代可以拿到稿费、可以出书了,但也没有了梦想;生活状况好转,但也变得无趣了;作家振作起来了,却冷淡和无耻多了。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同时带来好坏两个方面。从积极的方面讲,自由使文学生活空前活跃起来,作家摆脱了思想的束缚,他们的工作不再服从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不用顾忌任何时髦的体系和什么团体的价值,而真正成为顺应内心需求的创作,由此而使创作观念、内容和风格都日趋丰富,出版和发表的形式也多样化:除了官方已有的出版社、杂志社以外,出现了很多私营报刊、出版社,如《独立报》、瓦格利乌斯出版社等,以及新设立的一些文学奖,如由英国人出资设立、后来赞助商几易其主的“布克小说奖”、德国人出资设立的“普希金

文学奖”、俄《独立报》设立的“反布克奖”、俄当代文学研究院设立的“格里高利耶夫奖”等,增进了不同美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使作家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并且帮助作家一定程度地解决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作家们坦言,文学没有了书刊检查机关的审查,同时也失去了良心的监督。“市场”这个看不见的魔棒开始积极介入文学的发展进程,在写作、出版、评奖等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作用。伊万诺娃承认当大家彼此争斗的时候,来了一群文学商人,把所有人都扫到“过去”里了。在动荡、纷杂的社会条件下,文学创作沉渣泛起,纯文学受到冷遇,俗文学大行其道。出版家不再关注作家的思想倾向、所属派别,而是敏锐地选择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即所谓“有卖点”的作品进行出版,也开始组织写作。

市场成为影响当今文学发展之重要因素的现象已经引起文学家的关注。著名评论家邦达连科发出这样的疑问“当政府没有文化政策的时候,当文化精英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零时,当‘厚’杂志如乞丐一般生存时,是那些大出版商在决定着我们国家的文化政策,而他们又将会把我们带向哪里?”^[3]而马卡宁的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年)之所以深刻,就在于它揭示出一个作家在苏联解体前后两种社会情境下所面临的最深层次的困扰:解体前是政治压力,解体后是市场诱惑。小说主人公在苏联时期不愿屈从于克格勃的淫威而违背自己的良心,在解体后不以出卖自己曾经的地下人身份去换取钱财和地位,所以成为一个在两种时代都自愿放弃写作、永远沉默的地下人。不媚上,不媚俗——作家以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真正含义的思索。

二、“去中心化”与“娱乐化”——文学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苏联时期,文学是“我们的一切”——是

舞台、是哲学、是社会学、是心理学。文学作为党的喉舌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家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待遇。作家与政治关系紧密,常常出现一部作品引起全国讨论的局面。苏联解体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也不再处于社会需求的中心,不再是俄罗斯文化的同义语。虽然经历了1990年代的挣扎和论争,但是文学中心主义时代依然不可避免地呈现大势已去的态势,甚至出现了文学已经死亡的论调。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评论家拉蒂宁娜和作家加尔科夫斯基。拉蒂宁娜在2001年总结前十年的文学时用了《文学的黄昏》这样的标题。她从“文学期刊订阅量的锐减”及“没有出现一部可以名留史册的大作”这两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加尔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中遗憾文学作为一种神话、作为一种思考世界和掌握世界的方式正在消失。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两位文学家的观点虽然有些偏激,却也道出了文学地位的根本变化。对于少部分人来讲,文学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文学则是一种“不太必须的休闲”。买书已经属于“文化购物”的一种,“读者—文学”关系具有了私人化、个性化特点。作家的文学观念与意识同样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坚守文学的社会使命,依然认可作家的预言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角色,继承俄罗斯文学透视心灵、感知人性的优秀传统,在整个社会旧有的价值体系崩溃、道德标准缺失、个人生存意义迷失的状况下,担负起摆脱文化危机、重建民族同一性的重任。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抛弃文学的“教育”与“训诫”功能、还原其精致的美学游戏的论调,认为作家仅仅是工艺师。他们以娱乐读者为己任,以大量“街心花园”风格的作品赢得市场,给普通读者的思想意识带来麻痹或者更大的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到来之际,在社会环境已经从动荡过渡到

平稳的情况下,俄罗斯知识分子依然清醒地意识到其中所隐藏的严峻问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匮乏。他们重新审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历程,发现文学在构建民族精神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重提“文学中心主义”,希望回到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时代。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戈卢布科夫在《21 世纪初文学及俄罗斯文化密码》一文中指出,当代社会意识(潜意识)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某种思想(意识形态)的空洞。它大约产生于 15 年之前,现在更加严重。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政治阶级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于是十年来在不断寻找“俄罗斯思想”。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一种思想的真空,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民族同一性,它又是怎样构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文学的非中心化。他认为能够填补这个空白的只有文学,因为俄苏文学中那些经典的人物形象早已从书本进入民族意识中,作为民族形象而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着作用。他呼吁国家重新对文化生活进行干预,从思想上培养和教育读者。伏·萨哈罗夫也曾指出要像别林斯基时代那样,教育和争取那些绝望的、被所有人欺骗的、被赶到角落里的、沦为赤贫的读者。他认为将会出现这样的读者。这令人想起当年纳博科夫说的一段话:应当去培养真正的读者,让他重新去相信文学,使文学成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三、江山代有才人出——文学创作队伍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的 20 年来,老作家笔耕不辍,新作家层出不穷,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更迭。前十年,解体前就比较有名的作家中,一部分不幸辞世,如女诗人德鲁宁娜和以《萨什卡》闻名的小说家康德拉季耶夫,侨民文学作家多夫拉托夫等;一部分逐渐淡出文坛;有的在参与了新俄罗斯文学的一段进程后离去,比如文坛宿将列昂诺夫发表长篇巨著

《金字塔》后以 95 岁高龄去世,奥库扎瓦和谢尔盖耶夫获得布克奖后三四年间去世,布罗茨基、西尼亚夫斯基等在国外相继去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坚持创作,影响力不减当年,如索尔仁尼琴、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叶基莫夫等。解体后一批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不太得志的作家进入创作的丰收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比如“四十岁一代”作家中的马卡宁、普罗哈诺夫等佳作频出,马卡宁被誉为“当代文学活着的经典”;女作家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等引领“女性文学”的风潮。“三十岁一代”作家托尔斯塔娅、叶·波波夫等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力军;一批“地下文学”的先锋代表如索罗金等不仅正式登陆当代文坛,而且迅速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一批中年作家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如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安德烈·沃洛兹、尤里·波里亚科夫、尤里·科兹洛夫、阿·瓦尔拉莫夫、弗·别列津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文学家、评论家新旧更替明显,老作家逐渐淡出文坛,新作家不断涌现。被视为文坛教主的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标志着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人物都已退出历史舞台。“60 岁一代人”的旗帜——阿克肖诺夫、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的离开都是不小的损失。比托夫和拉斯普京虽有新作问世,但可以说他们最优秀的作品都是在 20 世纪写下的。“40 岁一代作家”的最后一批领军人物还在支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代小说的面目。马卡宁、普罗哈诺夫、利丘金等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并在文坛上引起轰动。女作家中乌利茨卡娅时有新作问世,《达尼埃尔》的发表被看作十年中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斯拉夫尼科娃在创作上实力突出,2006 年以《2017》一举获得俄语布克小说奖桂冠,她还同时进行文学评论、做“处女作奖”的协调人,成为近十年俄罗斯文坛上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评论家兼文学活动家。一批“70 后”作家

如帕夫洛夫、谢恩钦等进入创作的鼎盛期,逐步有实力问鼎大型文学奖项。大批年轻的,90年代闻所未闻的作家涌入文坛,他们在全新的时代环境下生长,在20-21世纪之交登上文坛。很多人一边自己写作,一边关注同龄人或者同时代人的作品,在创作和评论两个领域都显现出一定的才干。新世纪之初设立的独立文学奖“处女作奖”活动专门针对25岁以下(从今年起改为35岁以下)的文学新人,使大批文学青年得到了学习、交流、提高及展示自己的机会,促进了他们自身文学才能的开发,为发现和推出文学新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作家以年轻的激情掌握当代社会情绪,用自己的写作去积极影响社会,为重振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发挥作用。也许他们对生活的提炼还有些不足,在反映现实的经验上还有些欠缺,但是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创作实践,逐步扩大自己的创作范围,深化自己的思考力度,他们就必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俄罗斯文坛未来的生力军。

这些作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俄罗斯境内与境外相呼应的比较强劲和庞大的队伍。无论是命运曲折,还是生活穷困,他们身上珍贵的品格都没有被摧垮,也没有被磨灭,反而经过作家一腔激情的铸造和冶炼,迸发出灼人心目的火花。这些具有相当数量的作家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承担者,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希望和力量之所在。

四、从暴露与批判走向理性与多元——创作倾向与内容的变化

苏联解体前夕,文学作品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暴露与批判色彩,但大多局限于暴露苏联体制内人们道德缺失以及管理不善等方面的问题;而苏联解体初年,暴露的范围更广,批判的矛头也直指苏联的制度、体制等。索尔仁尼琴的“两部分小说”(由两个章节构成、有两个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对苏联社会进行重新思考,阿斯塔菲耶夫的一系列战争

小说对卫国战争加以否定,马卡宁的小说《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鲜明地批判了压抑个性的苏联审查制度,其他如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奥库扎瓦的长篇小说《被取消的演出》、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苏联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经过一段时间对苏联体制大加挞伐的热潮之后,作家开始审视当前的生活,审视民族发展历程,进入理性的反思阶段,反思苏联,也反思正在身处其中的这个自由社会的生活,很多作品表现出对现实的失望以及对未来民族之路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丰富多样,主题也各有不同。政治小说中,邦达列夫的政论性极强的小说《百慕大三角》对1993年十月“白宫事件”进行反思,巴克兰诺夫的《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对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进行了具体描述并发表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乡村散文”中,拉斯普京的一些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把批判矛头直指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对现实的满腔忧愤之情,同时也将拯救俄罗斯的路寄托在东正教上。叶基莫夫的《皮诺切特》反映了农村在集体农庄面临崩溃时出现的问题,扩而言之,俄罗斯正是这样的一个农庄,过去的一切都要消失吗?过去的道路是完全错误的吗?那么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作者把这样的疑问也留给读者。与“乡村散文”相对应,“城市小说”反映的是当代城市生活的困惑与迷茫:波里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和沃洛斯的《不动产》展示了解体后都市人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军队或者战争小说中,帕夫洛夫的《公家神话》和《卡拉干达九日记》揭露了苏联时期军队的种种黑幕,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通过战争反思人性,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描写卫国战争,巴普琴科的《山地步兵旅》以一个普通士兵的眼光描写车臣战争。一些以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员的活动为主题的作品尤其引人注

意: 莎拉波娃的《恐怖的太空梦》塑造了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沃伊诺维奇的《纪念像的宣传》通过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命运都与斯大林塑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反思历史, 告诫人们: 个人崇拜要不得。扎洛图哈的《新式共产主义者》通过儿子这个“新式共产主义者”与资本家父亲的斗争, 提出一个严肃的历史性问题: 俄罗斯, 你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一些类似反乌托邦的小说也对俄罗斯乃至人类的未来进行思考: 科兹洛夫的《夜猎》和托尔斯塔娅的《克斯》(中文译本名为《野猫精》)都对未来具有一定程度的警示作用。一些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小说, 如瓦尔拉莫夫的《圆顶》和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通过现实与幻境或梦境的相互观照表现人物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精神探求。以沙尔古诺夫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更多描写的是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生活。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 相当一部分当代俄罗斯作家深怀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国家发生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依然保持着一颗对现实充满忧患、对危机四伏的祖国痛惜乃至哀怨地律动的知识分子的心。他们继续对“我是谁”、“怎么办”以及国家前途、民族未来等问题的扣问, 穿透历史的纷乱扰攘与现实的沉沉暮色, 在抚慰人民心灵的同时不忘以理想之光为他们照亮前程。

五、兼收并蓄、多元发展——创作风格的变化

在美学上, 20 年中, 俄罗斯文学经历了后现代主义从兴盛到衰微、现实主义从危机到回归的历程, 现在逐步形成了多种风格兼收并蓄、多元发展的态势。苏联解体之初, 过去的信仰、价值观遭到践踏和遗弃, 人民思想混乱,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迅速抛弃, 现实主义被讽刺为“古老而又善良”的落后方法, 在文学评论界一时“失语”的情形

下, 发端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风起云涌的强势姿态迅速席卷整个文坛, 在文学创作界、评论界、出版界以及文学评奖活动中抢夺话语权。1991 年的安德烈·别雷奖获奖者中就有米·爱普施坦这位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干将。1992 年至 1996 年间, 后现代主义作家比托夫两次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1992 年、1993 年最初两届的俄语布克小说奖颁给了颇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 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 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和马卡宁的《铺着呢布, 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德国特普菲尔基金会设立的普希金奖 1992 年颁给彼特鲁舍夫斯卡娅, 1994 年颁给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等等。索罗金、佩列文等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受到读者和传媒的热烈追捧。到 90 年代中后期, 后现代主义创作经过短暂的热潮后迅速降温, 新世纪则出现了大量经过潜心研究、思考和积淀以后获得的追根溯源、理性分析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著作: 如斯科罗帕诺娃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爱普施坦的《俄罗斯的后现代——文学与理论》、库里岑的《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利波维茨基的《悖谬逻辑: 1920 - 2000 年俄罗斯文化中(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变化》等等。

在后现代主义盛极一时的年代里, 现实主义则遭受着巨大的怀疑与挑战, 对现实主义的嘲笑、摒弃之风兴起, 现实主义似乎走入秋天, 有些作家像大雁南飞一样纷纷离它而去。俄罗斯评论界对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讨论。随着 1990 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式微, 现实主义逐步回归。它经受住了各种冲击,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生存, 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深化、创新和开放, 终于摆脱危机, 走上日益广阔的发展道路。这是时代背景和俄罗斯文学传统使然, 也与俄罗斯作家坚持不懈的创作实践密不可分。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现实主义”的口号, 一些年青作家如沙尔古诺夫等甚至否定

虚构,以近乎白描的手法直接记录自己的生活,被称为自1917年以来,俄罗斯最直接了当、最忠于现实的文学。

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在继承其关注人生、忧国忧民等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日益表现出兼收并蓄、多元发展的态势:现实主义与现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相互交融,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渗透,网络文学作为艺术文本新的创造手段和流传方式,逐渐被主流文学认可(2010年的俄语布克小说奖破天荒地授予了一部网络小说)。按照作家兼文学活动家斯拉夫尼科娃的说法,文学艺术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综合,是使精英和大众能够汇合在一起的方式。她的小说《2017》中既有对爱情、国家前途等问题的严肃追问,也有远古的传说和对未来的幻想,同时加入探险、悬疑等时尚元素,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俄罗斯文学曾经拥有世界瞩目的辉煌,也曾度过黯然沉寂的时刻。今天,它刚刚走

出泥泞,或许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深信,俄罗斯文学必将焕发勃勃生机,在21世纪攀登新的高峰,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正如俄罗斯作家第十次代表大会总结的那样:俄罗斯文学没有死亡,而是获得了新生。尽管有许多力量要压制它,想使它变成庸俗的小节目或者餐馆文化,但这注定不会实现。它没有死亡,而是明确向上。我们坚定地拒绝其他有害的价值体系,继续坚持走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之路。它不拒绝良心,不为掠夺资本服务,而是信念、希望和真理的文学。

参考文献

[1] Тимина С.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С],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Logos“ 2002.

[2] Немзер А.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о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90-х годов [J] // Новый мир, СПб. 2000, №1.

[3] Бондаренко В. Нулевые [EB] <http://litfest.ru/news/nulevye/2010-02-02-31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